

调查研究与因果解释： 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刍议

叶成城

[摘要]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以民族国家为主，并带有地域属性和政策研究色彩。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被纳入一级交叉学科以来，国内学界日益重视其学科建设与方法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旨在综合运用人文与社科方法，一方面，它强调人文学科中的调查研究，重视用田野调查、历史考证等方式来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它也重视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解释，运用过程追踪、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定量分析等方式来尝试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随着数据丰富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模拟等前沿方法也逐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

[关键词] 区域国别学；方法论；调查研究；因果解释；混合方法；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3.04.008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3)04-0113-(14)

[收稿日期] 2023-03-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21FGJB006)

[作者简介]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9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之后，区域国别开始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重要方向，此后国内新成立了数十家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讨论区域国别的学科体系建设设想，^①梳理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②指出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创新方向。^③然而，较少有文章系统性地讨论和介绍这

^① 相关研究参见：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59-77;姜锋.浅谈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的两个能力与三个基础[J].当代外语研究,2022(6):12-16.

^② 例如朱锋.中国区域国别学:比较、鉴别与创新[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6):1-21;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J].国际观察,2020(5):53-73.

^③ 这部分研究参见：钱乘旦.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海,2023(1):114-116;田庆立.区域国别研究思维认知的创新路径[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6):22-35.

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本文试图完成的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源于美国,所以关于早期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脉络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区域国别学在美国而非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虽早,关于现代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则是到了2010年前后才逐渐出现。但在具体方法的叙述部分,本文会尽可能多地用国内学者的研究作为案例进行说明。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区域国别学的基本特征,以此作为区域国别学方法讨论的基础。第二部分梳理了区域国别学方法的发展脉络,展现其从人文学科到逐渐走向人文社科相融合的过程。第三部分具体介绍区域国别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即调查研究方法和因果解释方法。第四部分进一步介绍了数字时代区域国别学中的前沿方法。最后是简短的结语。

一、方法论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特征

区域国别学存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这是一个重要但并不准确的问题。一方面,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和综合学科,包含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区域国别学专家除了需要了解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治之外,还寻求掌握其历史、文学和语言,同时吸收人文和社科的成果。^[1]然而,学科的综合并不意味着方法论层面的特殊性。由于方法论的内核是一种数学逻辑,主要包含布尔代数和概率统计,而数学逻辑不会因为学科偏理论还是偏政策、偏政治经济还是偏历史人文而有所差异,因此,脱胎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方法的数量已经数不胜数,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的方法技巧,只能选择与适合自身研究议题和领域的研究方法。因此,将上述问题转化为讨论适合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更为合适。要理解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更加适合区域国别研究,就需要先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特征着手进行分析。从方法论视角来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区域国别学具有明显的地域属性,需要对当地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对区域研究有贡献的几个学科都存在地域限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和文化专家都只能在以地域为基础的学科范围内工作。^[2]区域国别研究对于了解当地语言、制度和文化的要求通常要高于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者可以为了检验不同理论较为容易地改变作为研究的样本(尤其是国家),而诸如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即便转向研究韩国,其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

其次,区域国别学带有一定的国家与政策研究色彩。区域研究之所以无法被视为客观的社会科学,因其时常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知识条件的影响,最典型的特征是研究者所在区域/国家通常并不被包含在内。冷战期间美国的区域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此来决定要研究的问题以及哪些地区被制定为一个“区域”,早期的区域研究地图包括苏联、中国(或东亚)、拉美、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东欧和中欧,以及后来的西欧,但不包括美国本身。^[3]这一特性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带有一定的政策研究或文化地理色彩,不可能完全科学化,因为科学化要求研究对象不能随着研究者国籍而发生改变。尽管区域国别研究会涉及到国家的历

史和文化,但并非单纯出于历史或人类学的兴趣,最终会涉及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怀,许多明确倾向于一般理论的社会科学家也时常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和政策研究的特征也使得学科研究的时间范围更加侧重于当下国家的内外矛盾,尤其是二战后的历史。

再次,区域国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具有诸多相似特征的民族国家,部分区域或次国家级单元也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是“具有一定文化、历史和语言一致性的相对较大的地理区域”。^[3]国际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非政府间组织等通常都不属于区域国别的研究对象。从地理上看,区域国别研究意味着将特定空间组合中的国家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倾向于将具有共同历史渊源的行为体归类在一起,它们在政治和社会在地理上相近,在语言和文化具有共同点,并能够通过制度扩散深刻地相互影响,可以对新思想产生独特的共同回应。^[4]因此区域国别中地域的区分并不是单纯的地理划分,而是隐含了案例研究中的“可比性”,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等等。

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目标和范围使其同时跨越人文与社科两个领域,由于受到时空情境的限制,尤其早期研究的样本数量以中小样本为主,因而部分材料收集和偏向质性的因果解释是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直到越来越多材料的数字化以及各类前沿的现代方法的被引入区域国别学之后,才开始有更多大样本研究。下文将通过梳理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来查看方法演进的过程。

二、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

区域国别学最初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出现在法国、俄罗斯、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东方学”的分支。早期游历东方的商人或传教士将许多见闻、传说、想象等因素用自身的理解糅合在一起,以西方人的视角查看东方世界的文化习俗、法律、风土人情等,将各类真假信息带回西方。具体区域国别研究学院的设立则始于一战后的英美,分别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斯拉夫学院(1915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1919年)和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部(1927年)等,主要以人文学科为主,教授语言、历史、习俗、法律和文学等。^[2]不同于以语言文化为主的东方学,早期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意在了解那些可以渗透和占有的地区,其研究方法总体是前现代的,以描述、考察和访谈等方法记录与当地相关的各类情报。

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及战后初期,出于美国政府情报和军事方面的需要,最初的区域研究中心出现在战略情报局的办公室,而早期大学开设的区域研究课程也与政府情报机构存在密切关联。^[5]美国政府支持区域研究项目,是将其作为了解潜在对手和盟友的重要渠道。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研究之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1946年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她受美国政府的委托来研究日本文化和社会,从而帮助美国制定此后的对日占领的政策,并掀起了日本研究的潮流。^[6]同时,洛克菲勒、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在战后推动地区研究培训的最初努力方向集中于东欧和东亚,这些都是美国面临竞争的主要区域,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启动了教育部国家资源中心计划,为美国多数大学的区域研究和培训提供了基础设施。^[4]

地区性知识的不断增长带来的影响开始不仅仅停留于政策研究层面,许多地区问题专家

也开始了对一般性知识的思考。诸如知名的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最初是一名苏联问题专家,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早期以拉美研究问题而闻名。1960年前后,区域国别学同比较政治学共同发展,开始出现一些区域比较研究。阿尔蒙德等人在1960年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是早期区域研究中的百科全书,分析了各个区域的历史、进程、结构和功能。^[7]摩尔在1966年出版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则细化到具体的社会结构问题,分析了6个国家不同的制度发展历程。^[8]在这一时期的比较区域研究中,区域国别和比较政治在方法论上仍然存在部分共识,因为双方都还没有那么“科学化”,也没有形成20世纪90年代之后那样精细的操作工艺,并且在学科建设初期仍然注重概念化以及“划分范畴”。^[9]

到20世纪70~90年代,区域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人文与社科之间互补。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是比较政治学开始科学化,大量的比较区域研究引入了类型学区分和密尔方法,开始探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和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学者以密尔方法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最大相似性的比较案例研究方法规则。^①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1979年出版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是这一时期代表性著作,她用更为精细的案例比较方法,从政府崩溃和农民反抗这两个视角出发,对导致社会革命的因素组合进行分析。^[10]与此同时,在美国官方资助之下,大量学者为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开始田野调查而非仅仅依靠档案与文献,通过长期观察与互动来发现因果机制。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东南亚研究,他通过对东南亚农民行为的观察,发现了当地农民反抗的原因,以及如何使用“弱者的武器”进行反抗。^[11]但坚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互补性也导致了区域国别学自身的裂缝,“传统”区域研究的支持者和“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理性选择理论不断盛行,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科学化。早期的区域研究被视作是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所发生事件的详细描述,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区域研究”的含义开始出现较大变化,其支持者并不否认描述的实用性,但他们的目标通常是概括,研究者在相对深厚的背景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依赖于熟练使用比较方法以试图超越特定的国家或地区。^[12]这种转变源于如下几方面因素。第一,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进一步重新构建了区域研究,提出了构建差异、多样性和联系的新方法,从1997年起,由福特基金会发起并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支持的一个新项目寻求在此新背景下再度振兴区域研究。^[13]第二,冷战的结束也使得批评者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认为应当更加着重讨论地区融合,分析全球范围的同质性而非差异性,以及从文化和地理的向度对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表示了诸多质疑。^[14]第三,过去与区域研究相关的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70~90年代逐渐式微,学界转而研究民主化、工业化以及国家建设等更为细致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一些研究者提出

^① 这部分方法讨论参见: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 65 (3): 682-693;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M].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需要区分“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基于区域的知识”：前者将区域整体作为分析的主要单位，试图了解区域内所有可以了解的内容，包括语言、历史、文化、政治和宗教等；而后者则是通过先了解一个区域，然后利用这些知识来处理超越给定区域的现象。^[15]这也意味着区域研究从地区性知识到一般性理论的需求转变，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也随之进一步科学化，当然在那个时期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当时的方法论之争。

1994年，加里·金(Gary King)等人的方法论著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问世后引发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的方法辩论。加里·金等人在著作中试图以定量分析(主要是回归分析)的范式来统一定性和定量研究。^[16]然而他的观点也被质性研究支持者所质疑，由此而引发了定性与定量“两种文化传承”的论战。^①经历“两种文化”之争后，区域国别研究也进一步科学化，开始兼顾内外部效度，即借助对时空情境的控制来强化密尔方法的前提条件，并强调因果机制以突显质性同量化研究中的因果推断(casual inference)的不同。^[17]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前后许多优秀的区域国别著作的作者同样是科学方法论学者。例如图利亚·法莱蒂(Tulia Falletti)和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虽然是拉美的区域比较研究的学者，但也为当时的质性研究方法改进作出了诸多贡献。类似的诸如东南亚研究专家丹·斯雷特(Dan Slater)和托马斯·比宾斯基(Thomas Pepinsky)，欧洲问题研究专家乔瓦尼·卡波奇(Giovanni Capoccia)和丹尼尔·齐勃拉特(Daniel Ziblatt)同样身兼方法论和区域比较研究学者两个角色。这也表明了具体区域研究和方法在这一时期的紧密结合，避免了脱离实证分析而空谈方法的问题。

三、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选择

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发展的历程来看，其主要经历了过去的人文学科方法到逐渐人文与社科方法的相结合过程，从而实现了调查研究方法和因果解释方法的融合。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其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尽管区域研究和非区域研究工作在研究目标和方法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区域研究并不能构成一种独特的方法，而将区域研究笼统地描述为理论性或“仅仅是描述性的”的说法则存在误导。^[18]区域研究需要根据时空情境、研究对象特征以及掌握的资料来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由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方法较多，较短的篇幅内无法详细展现更为具体的步骤和原理，本文更加侧重于展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工具箱”的框架或地图(见图1)，讨论各类方法的应用场景。

本文通过对区域国别的研究目的进行分类，从而根据不同的目的在“工具箱”中选择不同的方法。研究目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方法，另一种则是寻找因果关系的方法。尽管两者不存在人文和社科的严格区分，但是显然人文学科更侧重于前者，而许多社会科学则更重视因果解释，这是由学科分工不同所决定的。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材料收集和因果解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即增进对地区的了解、获得更为一般性的

^① 这部分争论内容参见：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知识以及为政策研究带来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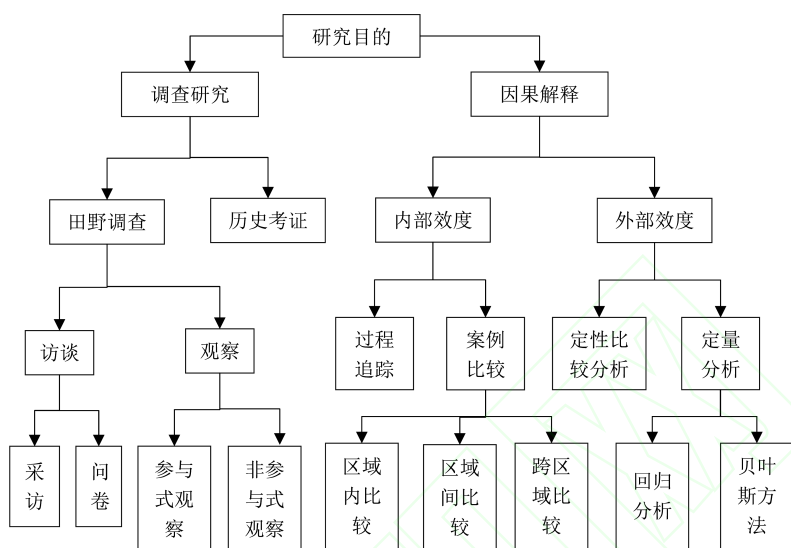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国别学中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使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 调查研究方法

进行调查研究 and 收集证据是解决问题和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的前提。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给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断,并形象地指出调查研究的目的及其复杂艰巨性:“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周恩来曾指出,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从多方面观察问题,要多听不同的意见,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20]在区域国别学中,同样需要对历史或现实的事件进行精确的考证或辨别,从而能够还原事件真相和解决问题,其中最为常见的方法是田野调查和历史考证。

1. 田野调查

知识的产生源于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组织等一系列环节,田野调查是获得特定区域专门知识的重要方法之一,具体包括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田野实验等研究方式。^[21]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和洞察,包括其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方面,既需要科学家的严谨也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具体来看,可以根据调查方式的差异分为两类方法。

第一类方法是访谈。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沃尔科特(Harry Wolcott)认为好的访谈是一种“创造性倾听”,需要倾听者扮演互动的角色,从而让说话的人说出最有用的话来。^[22]访谈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根据研究问题和目的,选择适当的访谈对象和场所;第二,确定访谈的主题、内容、方式和形式,制定访谈计划;第三,根据访谈计划,与访谈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第四,记录访谈内容,整理和分析访谈数据;第五,分析和归纳访谈对象的特征、观点和经验,得出结论。访谈可以分为采访和问卷等形式。采访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侧重信息的“深度”,通过了解研究对象的看法、态度和经验,收集详细的信息。而

问卷则类似于一种结构化访谈,侧重于信息的“广度”,可以以较高的效率获得大量的受访者信息,被访谈者可能只需进行少量回答甚至仅在几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即可。因而这两类方法的选择主要受到使用目的的影响,如果侧重于民族志或人类学的调查,希望了解细致的过程,则前者更合适;反之如果调查者试图了解大量群体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建立大样本的相关性联系,则后者更合适。

第二类方法是观察,即研究者通过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动态和环境,记录和描述所观察到的事实,以获取研究对象的信息。观察法需要通过选择研究对象、确定观察方式、观察和记录事实并最后进行归纳和分析。根据方式的差异,观察法可以分为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23]非参与式观察法是指研究者不直接参与研究对象的活动,而是从旁观察和记录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活动。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影响,提高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但也同样可能导致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存在产生疑虑,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参与式观察通常包含如下要素: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和使用当地语言和方言,积极广泛地参与当地的日常、例行和特殊活动,将日常对话作为访谈技巧,在外出时非正式地观察,在田野笔记中(通常按时间顺序)记录观察结果。^[24]这种方法可以让研究者对于情境有真实细腻的体会,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参与式观察往往历时较长,容错空间也更大,因为不像对于精英访谈或问卷那样,一旦忽略特定问题想要再追问的机会就比较小。斯科特认为这种实地调查就像滚动采访,“如果意识到有更多的问题要问某个人,第二天就可以在乡村小路上遇到他,从而有更多时间来进行观察和思考。”^[25]

2. 历史考证

同比较政治研究一样,许多区域国别研究仍以二手文献作为基础,但是如果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判断影响到了核心观点,或者推翻对特定事件的传统认知是研究创新的主要来源时,历史考证就必不可少。约翰·德罗伊森(Johann Droysen)认为,历史学方法中,下列三种因素是重要的:第一是可作为历史经验的材料,第二是在这些历史材料中为获得结论而采取的研究程序,第三是通过上述方式所得到的结论与我们试图理解的事实之间的关系。^[26]当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到具体国家的历史时,至少上述三个层次的研究是重要的。首先是通过交叉印证考察文献源的真实性,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史料比较。史料里面有虚伪、有谬误,史学家必须对史料施以严格的考证,比较方法是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这些比较包括“以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相比较,以本国史料与外国史料相比较,以原手史料与转手史料相比较,以同一种史料不同的版本相比较,”最终通过比较而“知其异同,窥其详略,由其异同详略,而求其症结所在”。^[27]其次是对不同类型历史文献的运用。研究者需要灵活运用直接和间接史料,应当将以间接史料为轮廓,将可信的直接史料用于校正间接史料的错误和弥补其不足。^[28]再次是在具体情境下来理解和考证一手史料。历史考证方法可以分为外部考证(external criticism)和内部考证(internal criticism)两个部分。外部考证指的是根据外部的状况来评估其价值,伯伦汉认为至少存在四个要素,即史料产生于何时、产生于何处、出自于何人以及分析该史料为独立所得还是引用他人所得。^[29]内部考证则用来检验其内容,包括作者是否见证其所记录的内容、所提及的事件、资料来源、人物是否可以被证实,同时需要注意史料产生的相对条件,包括史料

产生的环境是否对作者产生影响、史料陈述的语境等等。^[30]

(二) 因果解释方法

与调查研究方法相对的是因果解释方法,它的用途在于通过借助一套可重复的、标准化的流程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已有信息进行因果解释。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因果解释目的是为了表明,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下,自变量 X 是因变量 Y 的原因。因果解释可以根据样本的类型和特征的差异来选择不同的方法:个案研究适用过程追踪,小样本分析通常用案例比较,中等样本时则采取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大样本则使用定量分析。^[31]

1. 过程追踪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对于历史和材料的熟悉时常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像欧洲、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区域语言繁多,因而许多研究是个案研究。过程追踪是个案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因为这是检验内部效度必不可少的步骤。其中最为重要的步骤是察看特定案例中,因变量 $Y_{(t)}$ 是否按照因果机制所设想的那样随着时间而变化。具体的实证研究案例可以参考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等人关于南美区域的研究,他们分析了资源较为丰富的西班牙殖民地为何在长时段的经济增长反而不如资源较少的英国殖民地时,最后所给出的机制是“充裕的自然资源→攫取型初始制度→制度的路径依赖→经济绩效低效”。^[32]在这个案例中,如果用过程追踪进行因果检验,就需要围绕上述机制展开,分析资源充裕如何导致殖民者采取攫取型制度,包括收集当时殖民者的回忆录和决策过程的相关证据;与此同时,还需要讨论攫取型制度通过何种方式阻碍长期发展,例如寻找证据证明攫取型制度导致了对人力资源的轻视、治理绩效的低下或腐败等等。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使用过程追踪至少有两方面的用途。其一,当研究者试图将一般性理论被用于特定区域时,需要通过过程追踪来检验上述理论在该区域的有效性。其二,如果研究者试图将该区域的经验进行理论化和一般化,则需要先用过程追踪来确认内部效度,然后通过跨案例研究方法来拓展其外部效度。

2. 案例比较研究

案例比较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由于区域国别研究一定程度服务于政策,研究更加聚焦于区域内的大国,而区域内大国数量有限,因而其通常是小样本研究。小样本分析的底层逻辑是密尔方法中的求异法,即认为在最小化差异的情况下,那个存在差异即是原因。^[33]由于区域研究本身更加强调地区知识的特殊性和情境的重要性,因而它与少案例研究中的求异法有着天然的逻辑一致性。因而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CAS)的概念,试图在保持区域知识重要性的同时,通过归纳比较来促进一般性理论的构建,具体而言,CAS又可以细分为区域内比较、区域间比较和跨区域比较。^[34]

第一,CAS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区域内比较。它比较了特定区域内不同地理实体的某一个方面或特定的现象,例如弗雷特通过比较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建设历程发现,认为那些出现激烈抗争政治的国家会有更加团结的精英集团,由此而塑造了强国家的发展道路。^[35]区域内比较最大的优势是控制了大多数时空情境的差异,对案例的时空规制看似通过减少案例的外部效度而增加了其内部效度,但这种精确度背后的抽象的概念化的因果机制反而可能会增加其推广性,因为它实现了关键变量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变化。^[36]

第二,区域间比较指将两个或多个区域作为整体进行比较。这种研究的重点通常是影响世界不同区域的广泛进程或变革进程,这类研究主要的想法是确定一个区域的模式并互相比,讨论世界不同地区的区域为什么以及以何种具体方式对类似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14]最著名的案例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大分流之谜”,其中一个问题是美洲金银推动了西欧的现代化,而为何具有相似条件的东亚(主要是中国)却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飞速发展。^①

第三,跨区域研究指的对不同地区的分析单位进行比较。对于不同地区的单位进行比较时,显然会受到方法论上的质疑,因为当案例选择侧重于最大相似性时,地区间巨大的差异可能会阻碍准确的案例比较。同时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而言,准确的观察依赖于对所处国家的深厚背景知识,即使掌握必要的语言技能也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即便存在这些困难,进行跨区域比较是值得的,因为它们可以检验在学科和区域研究范围内发展的理论和概念的普遍性。^[14]对国家进行跨区域比较的目的在于获得超越地区的一般性知识,这显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案例同质性的质疑,因而本文的建议是跨区域的比较不能跳过内部效度环节,需要侧重于对机制的求同而非简单地对因素使用密尔方法进行类型分析和因果推断。

总体而言,跨区域比较和区域间比较的争议会更大,因为相对较小的题目更不容易产生争议,但仅限于区域内比较也时常会失去对一般性理论的追求,因而CAS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权衡内外部效度。

3. 定性比较分析

QCA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查尔斯·拉金等人(Charles Ragin)发展了QCA,意在通过布尔代数来分析获得解释结果变量的因素组合。^②尽管一些QCA软件也可以处理较大的样本,但QCA最适用的样本数量仍然是介于小样本和大样本之间(大约10~40个样本),即数量多到无法逐个进行案例研究,但又不足以进行定量分析。在部分区域研究中,如果研究对象包含中小国家,在欧洲、非洲等区域的样本数量时常会达到中等规模。

QCA分为清晰集、模糊集以及多值分析等方式,采取何种方法则需要根据变量(尤其是被解释变量)的特征来加以分析。其一,当变量具有明显的二分属性时,例如在查看欧洲国家在1848~1851年间是否出现明显的制度变革,就适合用清晰集来进行分析。^[37]其二,当存在较多连续变量时,则适合用模糊集。有研究在讨论欧盟28个成员国2012~2016年的数据时,用失业率、反移民率、欧盟不信任率、政治腐败等连续变量来衡量民众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些变量全部都是连续变量,因而用模糊集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损失。^[38]其三,多值分析介于清晰集和模糊集之间,适合于无法使用连续变量但用二分变量进行描述又不够准确时。例如在讨论冷战后东欧国家转型时,两个关键的解释变量为资源扭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

^① 大分流问题的讨论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化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J].社会科学战线,2004(1):42-69.

^② 定性比较分析的主要文献参见:拉金的“三部曲”。Charles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Charles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Charles Ragin,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需要用低、中、高三档来进行细分。^[39]

此外,在对于区域国别研究中使用QCA还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QCA无法处理时间维度的变化,因此更加适用于短期内的剧烈变化,因而被解释变量不能是区域内国家数十年的增长率或者长期的制度状态等等。其二,由于样本较少,其稳健性要弱于定量分析,QCA所使用的样本应当包含了区域内的全样本,因为一些关键样本的增减可能会导致一些解(solution)的一致性(consistency)出现剧烈变化。

4. 定量分析

尽管区域内部的国家数量仍然是中小样本,但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和数据化程度的增加,定量分析也越来越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中最重要方法之一。至少几类方法或理念的发展使得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大样本分析成为可能。一方面,随着横截面单位的观测资料越来越多,新的数据源使计量经济学家能够构建和检验比单个横截面或时间序列更为复杂的模型。^[40]面板数据技术出现之后,当时间维度被同时记入之后,区域国别研究的样本数量相比起截面数据就会成倍增加。另一方面是次国家比较分析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从而扩大了可供分析的案例数量。^[41]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传统的频率学派,频率学派将概率解释为事件在大量重复试验中出现的频率,适用于样本容量较大、数据较为稳定的情况。加里·金等人在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的基础上给出了定量研究设计的基本步骤,通过建立统计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因果推断,从而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①频率学派的应用场景广泛,可以用于探究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例如通过对多个国家/次国家GDP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国家之间出现经济水平差异的原因,进而制定政策建议。另一种则是贝叶斯流派,强调主观概率的合理性,认为主观经验和知识可以影响对事件概率的判断,通过证据来不断调整人们对特定事物的信念。^[42]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贝叶斯学派主要应用于制定政策建议、评估风险、预测未来趋势等方面,通过对某一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数据进行贝叶斯分析,预测该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面临的风险,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国内的具体研究可以参见陈冲等人对缅甸国内冲突案例(2010~2020年)的预测,这项研究通过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与集成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展示了在大数据时代通过空间依赖性可以在更加精细的时空维度提升冲突预测的准确率。^[43]

四、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前沿方法

随着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10年之后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大数据越发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被视作比肩于实验范式、理论范式和仿真范式之后的“第四范式”。^[44]大数据方法更加关注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过去依靠因果路径的方式

^① 这部分定量分析的讨论参见:Paul Holland. 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 1986, 81 (396): 945-960;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所无法发现的许多关联性。大数据可以使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分析文本数据,或使用数据挖掘技术发现数据中的模式和趋势。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升和数据的增多,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算法”开始逐渐出现。借助于海量高维度的数据训练,智能算法可以不依赖于指导它们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学习算法迅速实现迭代,从而能够解决过去一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前沿方法也需要进一步介绍。

首先是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 ABM)。ABM是一种计算机模拟方法,它可以用于研究个体行为规则如何产生宏观的规律和组织,从而建立微观行为体和宏观结果之间的联系。^[45]研究者可以通过微观而非宏观层面的建模,模拟这些自适应的行为体,从而研究这些行为体彼此之间以及对外部影响的反应所产生的涌现性。^[46]ABM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在虚拟计算机系统进行诸多人类社会系统实验,通过使用一系列参数或让一些因素随机变化来进行重复试验,这些实验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或者会面临道德困境。^[47]例如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用实验方法研究战争、选举或族群冲突较为困难,会面临诸如可行性和伦理道德等障碍,而且在现实情况下,上述事件是无法重复发生的,而ABM可以解决上述问题。ABM通过计算机模拟可以不断地通过机器学习训练模型和对参数进行校准,测试具体机制在特定区域的有效性,同时研究者还可以借助于历史数据对未来进行预测。在国内的区域研究中,唐世平的团队使用ABM成功对2020年美国大选中6个摇摆州的得票率进行了预测。^[48]

其次是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由于多数的区域国别研究都会涉及到具体的地域,包括ABM也涉及到了在特定区域行动行为体,因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自然而然出现了地理信息系统的需求。GIS是一个管理、存储和现实空间数据的软件系统,它使用软件包(如ArcGIS)来创建和分析空间数据。^[49]GIS能够收集和分析大量与空间位置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数据,并提供了一套建立在空间区域、距离和关系的几何度量之上的复杂分析工具。^[50]一方面,GIS可以帮助研究人员通过可视化和分析地理数据将卫星图像、统计数据、传感器数据等不同来源的地理信息数据整合在一起,更加直观地将数据呈现给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中,黄振乾将QGIS作为辅助工具,展示了中国或国际组织援助项目空间分布的经济效果差异。^[51]另一方面,GIS可以执行各种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如ArcGIS可以使用3D分析、网络分析、空间分析、地理统计分析等诸多扩展模块,实现空间插值、空间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等功能。^[52]这些工具使得GIS在数据分析和预测方面变得更加强大和有用,在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尽管使用GIS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但是这一理论模型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其应用也从过去的描述性统计逐渐深入到推断性统计之中。例如陈冲和庞珣用GIS方法分析非洲1994~2013年间的恐怖袭击风险,运用GIS技术将非洲分为上万个时空网格,并使用了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通过地理定位在时空网格上的叠加,对恐怖袭击在网格层面上的时空特征进行解释和预测。^[53]

再次是混合方法的使用。混合分析是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为了激发不同研究方法的互补优势而将多种方法聚合起来的分析,以此避免单一方法的缺陷。^[54]图1中已经区分了不同目的和不同案例特征所需要不同的方法,结合本文第四部分所提及的前沿方法,混合方法可

以视作是多种方式的应用。在具体的信息搜集过程中至少可以选择访谈、观察、历史考证、大数据抓取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方式；在因果解释的阶段，则可以在过程追踪、案例比较分析、QCA、(包括大数据和GIS在内的)定量分析以及ABM等方法中选择2种或2种以上方法。因此可以看到，混合方法的类型非常多，在因果解释阶段就有十余种排列数，再乘以调查研究阶段的方法种类选择则高达数十种混合策略。诸多因果解释方法组合中，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常用混合方法的仍然是“嵌套分析”，即“案例研究+定量分析”。^①

五、结语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仍然处于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因而对研究方法的讨论有助于增进和丰富人们对区域国别学这一学科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从其交叉学科的特色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区域国别学始终需要保持人文与社科的互补、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结合、区域特色与一般性知识的平衡，因而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使用各类方法的组合。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使用诸如田野调查和历史考证等调查研究方法来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它需要过程追踪、案例比较、QCA和定量分析方法来处理证据，并从中获取对应的因果联系；同时，区域国别研究还要与时俱进，借助于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GIS和ABM等前沿方法来解决更多的问题。

除此之外，区域国别研究中还可能涉及到其他诸多方法，包括自然实验、概念分析、文本分析以及数理推导和博弈论等形式逻辑方法，由于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因而不再一一进行赘述。总体而言，方法仍然是工具而非目的，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目标仍然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因果解释来“解决问题”，并且各类方法也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因而更为务实的做法是根据研究目的和样本特征，结合现有的前沿技术，因地因时制宜地选择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 [1]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J].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97, 30(2): 166-169.
- [2] Zoran Milutinovic, ed. The Rebirth of Area Studies: Challenges for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M]. London: I. B. Tauris, 2019: 2-5.
- [3] Ali Mirsepassi, Amrita Basu, and Frederick Weaver, eds. 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Recasting the Area Studies Debate [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3.
- [4] Todd Landman and Neil Robinso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162-170.
- [5] Hossein Khosrowjahi. A Brief History of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 Arab Studies Quarterly, 2011, 33(3/4): 131-142.

^① Evan S. Lieberman. 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 99(3): 435-452;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参见: Evan Lieberman. Race and Regionalism i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6] 鲁斯·本尼迪克特. 大国历史大国性格:菊花与刀[M]. 黄学益,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7]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詹姆斯·科尔曼.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M]. 任晓晋,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8] 巴林顿·摩尔.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M]. 王茁,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9] 汪卫华.“解耦”还是“脱钩”?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关联[J]. 国际政治研究,2021(6):17.
- [10]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1] 詹姆斯·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2] Peter Katzenstein. 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001, 34(4): 789-791.
- [13] James D. Sidaway. Geography,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atic of Area Studi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103(4): 986-988.
- [14] Matthias Basedau and Patrick Köllner. Area Studies,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ontext, Substance,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J].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2007(1): 105-112.
- [15] Kenneth Prewitt. Area Studies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Redefin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J]. Berliner Osteuropa Info, 2003(18): 8-11.
- [16]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7] 叶成城,唐世平.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0):22-47.
- [18] Gerardo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7, 40(1): 5-31.
- [1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110.
- [20]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3.
- [21] 刘青尧. 特定区域信息的收集:一项基于田野调查经验的分析[J]. 国际关系研究,2022(4):35.
- [22] 哈里·沃尔科特. 田野工作的艺术[M]. 马近远,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94-95.
- [23] 卢凌宇. 政治学田野调查方法[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26-47.
- [24] George J. McCall. The Fieldwork Tradition. in Dick Hobbs and Richard Wrigh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Fieldwork[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4-5.
- [25] 赫拉尔多·芒克,理查德·斯奈德. 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M]. 汪卫华,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398.
- [26] 德罗伊森. 历史方法论[M]//刘北成,陈新. 史学理论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4.
- [27]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1986:87-88.
- [28]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4-18.
- [29] 伯伦汉. 史学方法论[M]. 陈韬,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60-184.
- [30] 劳伦斯·纽曼. 社会研究入门[M]. 刘佳昕,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389-390.
- [31] 叶成城. 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解释:逻辑、样本与方法的权衡[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6):18-30.
- [32] Matthew Lange, James Mahoney and Matthias vom Hau.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 of Spanish and British Colon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111(5): 1412-1462.
- [33] John Mill.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98: 478-537.
- [34] Ariel Ahram.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J]. *Qualitative Research*, 2011, 11(1): 69-90.
- [35] Dan Slater.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6] 叶成城, 黄振乾, 唐世平. 社会科学中的时空和案例选择[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3): 145-155.
- [37] 叶成城. 第二波现代化之“帝国的共鸣”——1848年欧洲变革的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J]. *欧洲研究*, 2021(4): 62-88.
- [38] 郎友兴, 吕鸿强.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因果路径——对欧盟28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2): 123-134.
- [39] 唐睿, 唐世平.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2): 39-57.
- [40] Cheng Hsiao.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Panel Data. *Econometric Reviews* [J]. 1985, 4(1): 121-174.
- [41] 游宇. “大事必作于细”: 比较政治学中的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5): 114-124.
- [42] Colin Howson and Peter Urbach. *Scientific Reasoning: The Bayesian Approach* [M]. Chicago and La Salle: Open Court, 2006: 91-99.
- [43] 陈冲, 胡竞天. 空间依赖与武装冲突预测[J]. *国际政治科学*, 2022(2): 86-123.
- [44]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M]. Washington: Microsoft Research, 2009.
- [45] Joshua M. Epstein. *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 Studies in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4-7.
- [46] Michael Macy and Robert Willer. From Factors to Actors: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and Agent-Based Modeling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 28(1): 143-166.
- [47] 奈杰尔·吉尔伯特. 基于行动者的模型 [M]. 盛志明,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2: 6.
- [48] Ming Gao, Zhongyuan Wang, Kai Wang, Chenhui Liu and Shiping Tang. Forecasting Elections with Agent-Based Modeling: Two Live Experiments [J]. *PLOS ONE*, 2022, 17(6): 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70194.
- [49] Heywood Ian. *An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Third Edition* [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06: 18-22.
- [50] Jordan Branc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6, 70(4): 845-869.
- [51] 黄振乾. 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坦桑尼亚为个案的观察[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8): 127-153.
- [52] Kang-tsung Chang,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Ninth Edition* [M]. New York: Mcgraw-hill, 2019.
- [53] 陈冲, 庞珣. 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GIS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J]. *外交评论*, 2020(2): 121-154.
- [54] 张春满. 比较政治学中的混合分析方法[J]. *学术月刊*, 2017(9): 70-80.

[责任编辑 孟祥臣]